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发展动向评析*

周 凯

【内容提要】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脱胎于西方汉学研究和中共研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为探究中共治国理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异域视角。当前，海外学者比较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高压反腐及其内在逻辑、意识形态建设与文化软实力、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议题，并呈现出研究主体日益多元化、研究议题紧跟时政热点、理论框架亟待更新等特征。总体而言，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注重比较视野、实证分析以及专题化研究，但存在着理论预设局限于政体二元论、概念使用过度拉伸、研究结论以偏概全等问题，须对其进行理性辨析与批判性思考。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 中国研究

作者简介：周凯（1983-），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新时代党的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 200240）。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海外学界掀起了新一轮“中国热”——国外顶尖高校、科研机构、高端智库有关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课程设置、专题研讨、学术成果日渐增多，影响广泛。国外学者关注哪些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议题？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有何新的发展动向？其研究范式有何值得借鉴之处？又存在哪些需要理性思辨之处？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展开系统梳理和评述，以增进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发展演变和理论逻辑的了解与反思，在比较视野中推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

一、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发展演变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发轫于西方汉学研究及中共研究，并逐步发展成为以中国共产党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汉学研究是指西方对古代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社会等领域的系统探究，其目的是向西方世界描述推介东方古国的异域风貌和文化特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界逐渐兴起了一股“反汉学”之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主张加强对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入研究，以服务于教育公众和政策制定，从而实现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有机结合，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研究的基本范式。自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研究中逐渐衍生出了一个新流派——中国共产党研究，主张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作为革命党和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围绕党的历史、党的建

* 本文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2017YZD09）的阶段性成果。

设、党的意识形态、党的革命实践、党的治国理政等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专题研究。从研究议题和研究风格上来看，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化，即萌芽期（1921—1949年）、成型期（1950—1978年）、发展期（1979—2012年）和迷茫期（2012年至今）。

第一，萌芽期（1921—1949年）。该时期西方学界尚未对中国共产党研究产生浓厚兴趣，一些驻华记者、外交官及个别学者发表了少量有关中共革命实践的报告和书籍，侧重于描述中共领导下红色政权、武装革命和工农红军的基本情况，主要从“猎奇”角度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共的产生和崛起。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和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等。

第二，成型期（1950—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学界不得不对一系列有关中共革命及其政权建设的问题进行回应：为何中国共产党能够胜出？其如何巩固新生政权？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有何显著特征？这些问题吸引了大批西方学者转向中国共产党研究，研究风格也从描述性介绍转为分析性解释，基本奠定了以中共作为切入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并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力作，如鲍大可的《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政治与政权》、裴宜理的《无产者的力量：“文革”中的上海》、马若德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

第三，发展期（1979—2012年）。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得到迅猛发展，具体表现在如下两点：（1）研究内容日益丰富，涵盖了诸如中共执政合法性、政党建设与体制改革、社会维稳与基层治理、党内民主与政治协商等多维度研究议题。（2）学术成果“井喷式”爆发，有关中共引领改革、应对挑战及其自身建设的科研论文、学术专著、智库报告等大量涌现^①。客观而言，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蓬勃发展实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副产品：一方面，中共主导的各项改革议程吸引了西方社会的强烈关注；另一方面，海外学者获得进入中国开展田野调查和学术交流的大量机会。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共同促成了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繁荣兴盛。

第四，迷茫期（2012年至今）。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目前进入了一个充满纷争的迷茫期。首先，所谓“中共崩溃论”之争。2016年，沈大伟和狄忠蒲分别发表专著《中国的未来》和《独裁者的困境：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策略》，声称中共如果继续目前的“硬权威”治理模式，将难以避免地迎来政体崩溃的结局。然而，郑永年、杨大力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现有政治体制依旧极有活力，中共的执政经验正成为一些国家执政党争相学习与参考的重要内容^②。牛津大学的许慧文（Vivienne Shue）和蓝梦琳（Patricia M. Thornton）则主张西方学者应尽快走出“中共何时崩溃”的窠臼，转向扎实推进对中共主导下政体运行的中观及微观机制研究^③。其次，研究方法之争。西方许多新生代学者主张依据主流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型和定量方法来研究中国共产党，并力求在学科专业期刊而非聚焦中国的区域性综合期刊发表研究成果。这一转向致使一些海外学者对研究方法过度沉迷，以致轻视或忽略了为西方民众和政策制定者了解中国共产党提供智力支持的社会责任。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欧博文所言：“他们本质上并不在乎中国的现实深处正在发生什么，

① 该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李侃如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吉利（Bruce Gilley）的《统治的权力：国家如何获得和失去合法性》、谢淑丽的《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沈大伟的《中国共产党：调整与适应》、李成的《通往中南海之路：中共十八大前高层领导群体》、狄忠蒲的《财富转化为权力：中共对私人部门的拥抱》、柏思德的《回归政党：中国如何治理》等。

② Yongnian Zheng, “Where Do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o from Her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0, No. 2, 2012; Dali Yang, “China’s Troubled Quest for Order: Leadership, Organization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Stability Maintenance Regim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6, Iss. 103, 2017.

③ Vivienne Shue and Patricia M. Thornton (eds.), *To Govern China: Evolving Practices of Pow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26.

他们更喜欢的其实是对现实世界泛泛的抽象描述。”^①

综上所述，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脱胎于西方汉学研究和中共研究，盛于对中共治国理政的问题聚焦与理论关照，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窗口。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库恩所言：“要了解中国，就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② 虽然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当下存在着一些内部论争，但其基本共识依然坚实如故，即理解当代中国必须聚焦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共自身。

二、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最新动向

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关于治党管党和治国理政的强力举措，给执政党自身及中国社会带来了显著变化，引发了海外学者的浓厚学术兴趣和理论思考。从现有研究来看，高压反腐及其内在逻辑、意识形态建设与文化软实力、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特征等成为海外学者最为关注的学术热点。

1.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热点

(1) 关于高压反腐及其内在逻辑。“苍蝇老虎一起打”的高压反腐是否能有效遏制干部腐败？海外学者针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迥异的答案。沈大伟和裴敏欣认为，虽然当前中共的反腐风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肃和持续，但这并不会根除腐败问题，高压反腐是治标不治本^③。马若德也指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中共的政治声誉，但反腐也是“双刃剑”，会引发党内某些既得利益者的不满和基层干部的不作为^④。与此同时，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具有实质性和决定性成效。克礼（Macabe Keliher）等学者认为，高压反腐与行政体制改革以及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完整体系，不仅旨在清除干部腐败和渎职现象，更重要的是彻底改变当前的政治文化，重塑中共政治运作的新模式和干部管理的新理念^⑤。彼得·劳仁特及其合作者则通过对中纪委2012年11月至2015年9月查处的全部腐败案例的定量分析发现，与高层领导的私交也无法对贪官本人提供有效保护，中共反腐是具有实质意义的重要举措^⑥。英国学者凯利·布朗指出，高压反腐的内在逻辑是中共为了巩固和实现长期执政目标而采取的 necessary 行动，是一场旨在改变党内错误权力观念和重塑良好政治生态的自我革命^⑦。

(2) 关于意识形态建设与文化软实力。中共的意识形态建设一直是海外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托尼·赛奇认为，“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的核心要义，具有理论新意和战略性^⑧。凯利·布朗等则指出，当前中共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特点是更加主动地从价值层面构建具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气质的理念与体系（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从而

① [美] 欧博文：《与学科理论对话还是与中国研究对话》，管玥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38465。

② 转引自刘少华：《海外中共学方兴未艾》，《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8月16日。

③ David Shambaugh, *China's Fu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pp.1-20; Minxin Pei, *China's Crony Capitalism: the Dynamics of Regime Deca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49-77.

④ Roderick MacFarquhar, "Searching for Mao in Xi Jinping's China", <http://bostonreview.net/politics/roderick-macfarquhar-searching-mao-xi-jinpings-china>.

⑤ Macabe Keliher and Hsinchao Wu, "Corruption, Anticorrup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5, Iss. 1, 2016.

⑥ Xi Lu and Peter L. Lorentzen, "Rescuing Autocracy from Itself: 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https://ssrn.com/abstract=2835841>.

⑦ Kerry Brown, "The Anti-Corruption Struggle in Xi Jinping's China", *Asian Affairs*, Vol. 49, Iss. 1, 2018.

⑧ Tony Saich, "What Doe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Dream About?", https://ash.harvard.edu/files/ash/files/what_does_xi_jinping_dream_about.pdf.

为巩固党的领导、凝聚共同理想以及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思想基础^①。《当代中国》主编赵穗生认为，当前中共发起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建设运动，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民族主义融为一体，目的是为了净化执政党自身和巩固其长期执政的地位，从根本上确保政治体制总体稳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顺利实现^②。《亚洲研究期刊》主编华志坚则对“中国梦”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梦”虽然具有多个面向，但最核心的内容是民族复兴，这并不与个人幸福产生矛盾，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是个人幸福的有力支撑^③。同时，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所高度重视的文化软实力问题也颇受关注。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在2014年出版的《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中，围绕安源罢工这一个案，考察了中共“文化治理”（culture governance）的政治传统，认为唯有充分认识中共文化动员的政治基因，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共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独有的比较优势和特殊之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也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建构——通过遍及全球的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战略，中共巧妙地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并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一定的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④。加拿大学者贝淡宁则分析了中共“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人才观，指出选贤任能是融合了传统儒家文化和现代国家治理的一种更适合中国政治文化的制度安排^⑤。

（3）关于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随着“党领导一切”的不断强化，党在不同领域中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双覆盖”）以及在社会治理中主导角色的重要性日渐凸显。狄忠蒲认为，中共在“两新”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经济组织）中推进党建工作是“列宁式政党”的内在要求——中共通过主动地在这些新兴领域中建立组织和发展党员，可以拓展执政党的组织基础并更好地监管和服务于这些经济社会最活跃的“细胞”^⑥。蓝梦琳则指出，在“两新”组织中建立基层党组织，既是党的领导在体制外的一种生动体现，又能够增强执政党在“两新”组织中的存在感和认同感。此外，这些处于新兴领域的基层党组织在参与各类公共服务过程中，还有助于改善执政党的政治形象，赢得更多社会认可和民意支持^⑦。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古大牛（Daniel Koss）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力量之源在于中共的执政能力，而其执政之基则是扎根于各行各业的基层党组织和数以千万的中共党员——通过无数的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中共得以有效贯彻政治决议、落实重大政策、引领社会治理^⑧。芮杰明（Benjamin L. Read）进一步指出，由执政党创制的基层行政单位（如居委会、村委会）是联结国家与社会的重要桥梁，并且通过多种柔性方式（如社区服务、邻里互助、矛盾调解等）广泛接触和团结民众，有效增强了中共对基层社会的管治能力^⑨。

（4）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特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海外学界

① Kerry Brown, et al., “Ideology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23, Iss.3, 2018.

② Suisheng Zhao, “Xi Jinping’s Maoist Revival”,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7, No.3, 2016.

③ Jeffrey Wasserstrom, “Here’s Why Xi Jinping’s ‘Chinese Dream’ Differs Radically from the American Dream”, *Time Magazine*, October 19, 2015.

④ Joseph Nye, “How Sharp Power Threatens Soft Power”,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24, 2018.

⑤ Daniel A. Bell,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79-198.

⑥ Tony Saich, “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61, 2000.

⑦ Patricia M. Thornton, “The New Life of the Party: Party-Building 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Greater Shanghai”, *The China Journal*, No.68, 2012.

⑧ Daniel Koss, *Where the Party Rules: The Rank and File of China’s Communist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3-34.

⑨ Benjamin L. Read, *Roots of the State: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in Beijing and Taipe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257-293.

也愈加聚焦这一重大变化及其政治特征。波士顿大学教授傅士卓认为，中共中央更加强调“党领导一切”。换言之，党的核心领导地位被不断巩固和强化，党的领导在社会各个层面予以进一步重申和全面体现^①。从领导风格而言，马若德将中共领导人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董事长型和首席执行官型。董事长型领导风格注重方向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顶层设计，而首席执行官型领导风格表现在对现有大政方针的坚决贯彻和狠抓落实。他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中体现出了兼具上述两种类型的新领导风格，即一手紧抓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一手狠抓贯彻执行和任务落实^②。此外，从领导体制来看，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认为，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在维护党内团结、保持国内稳定以及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同时，积极对集体领导体制进行新一轮的动态调整和创新实践，试图在权力集中与权力分享之间寻求一种新的重塑与平衡^③。

2.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特点

从上述最新的发展动向来看，当前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呈现如下三个基本特点。

其一，研究主体日益多元化。与汉学研究和中国研究不同，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已经走出“象牙塔”，进一步拓展到政界、军界、商界等，成为各类国际组织、高端智库、咨询公司的重要研究对象。例如，世界银行、美国兰德公司、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德国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等非营利性组织，以及麦肯锡公司、荣鼎咨询集团等营利性商业机构均设有专职科研人员或研究团队，对当前中共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行系统研究，尤其是对十八大以来中共的重要文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开展深入分析，以便积极研判与预测中共执政的战略方向与发展趋势。比如，全球最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就积极组织专家详细研究了中共十九大报告，并发表了《2018年我们能对中国期待什么？》一文，从中共经济政策调整与世界贸易格局变迁的角度分析预测了未来投资的机遇与风险^④。总体而言，这些新兴研究主体丰富了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维度和视角，突破了传统学院派研究过于注重理论阐释和理论建构，而忽视对策性思考的弊端，强化了对现实重大问题的预测性研究。海外学者已不仅仅满足于对某一议题“是什么”“为什么”的理论追问，而是更注重对“怎么办”“如何做”等策略层面的深度探讨。概言之，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不再停留于单纯地对中共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理论解读与学理分析，而愈加强调从实用性角度为母国国家利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或商业资本盈利展开战略分析与对策研判。

其二，研究议题紧跟时政热点。当前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拥有在中国学习工作的经历，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新提法新举措新变化敏锐度较高，更加热衷于追逐时政热点议题和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从研究议题变化来看，除少数学者依旧“执着”于中共执政合法性、政党体制、基层维稳等老生常谈的话题外，许多西方学者紧盯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提出的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研究侧重点来看，全面从严治党、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经济新常态、精准扶贫、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生态治理等问题，日渐引发海外学者的强烈学术关注。虽然针对这些热点议题的研究或多或少存在“跟风”之嫌，但对推动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议题多样化和提升其研究时效性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从研究方向选择来看，近年来一些西方中共问题专家对其研究方向进行了重

① Joseph Fewsmith,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Ringing in Xi Jinping’s New Ag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Iss.55, 2018.

② Roderick MacFarquhar, “Leadership Styles at the Party Centre: From Mao Zedong to Xi Jinping”, *China’s Core Executive*, No. 1, 2016.

③ Cheng Li,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Xi Jinping Era: Reassessing Collective Leadership*,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6, pp. 7-40.

④ Gordon Orr, “What Can We Expect in China in 2018?”,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china/what-can-we-expect-in-china-in-2018>.

大调整。例如，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而闻名学界的沈大伟，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博弈策略研究^①。无独有偶，以研究中共基层政权维稳机制而著称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李静君则转向了中国国有企业在非洲投资遇到的劳资纠纷问题研究^②。诸如此类的个人研究大幅度转向绝非个案，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正呈现出焦点议题更新快、学者跟进速度快的总体特征。

其三，理论框架亟待更新。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依然停留在威权主义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的解释框架之下，缺乏概念创新和理论突破。“威权主义韧性”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提出的理论框架，意在解释中共为何没有步苏共后尘，反而其执政地位不断得以巩固的现实状况。该理论框架的优点在于意识到了所谓“威权主义国家”执政党并非僵化保守、固步自封，而是能够通过权力交接制度化、选贤任能规范化、政治参与有序化等方式及时应对国内挑战与国际压力，从而实现政权巩固与延续。然而，该理论的缺点也显而易见，即“韧性”概念的外延过于宽泛，缺乏有效界定，导致越来越多的变量被吸纳到该理论框架之下——当任何因素都被视为“威权主义韧性”时，这一理论也就丧失了其精准解释力和理论生命力。例如，海外学者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村民选举、民主协商、“送法下乡”、“两新”组织党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归结为中共领导下政体韧性的重要表现。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的任何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都被机械化、简单化地解读为旨在延续其执政地位的主动选择或被动反应，是其政党适应性和政体韧性的显性表现，而本应大胆进行概念创新和理论建构的重要契机被有意或无意地错过了。因此，当前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亟待突破“威权主义韧性”的概念束缚和“惰性”思维，勇于超越西方政体理论和民主化理论的羁绊，积极实践更加符合现实世界发展经验的理论框架创新。

三、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启发性与局限性

中国共产党研究在海外已发展成为以中共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跨学科交叉型研究领域，不仅为中外学界审视和思考中共治国理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异域视角，也对国内学界进一步推进党史与党建研究极具启发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海外学者深受西方价值理念及学术规范影响，在学习与借鉴其研究成果时，须对其进行理性辨析与批判性思考。

1.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启发性

第一，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注重比较视野。西方学者往往倾向于弱化中共的独一无二，主张将其置于纵向历史或横向现实的比较框架之下，从中发掘中共与其他政党的共通之处与比较优势。例如，在马丁·季米特洛夫编著的《为何共产主义没有崩溃》一书中，来自欧美的十二位学者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垮台的苏联共产党及东欧国家共产党，与现存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古巴、越南、朝鲜、老挝）的执政党进行了细致比较，发现以中共为代表的这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展现了较强的制度调适性（包括经济制度的改革力度、公共政策的回应效率、政治制度的吸纳性、意识形态的弹性等）^③。此外，郑永年从纵向对比角度分析了中共与国民党在组织结构与组织

^① David Shambaugh, "US-China Rivalry in Southeast Asia: Power Shift or Competitive Coexist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2, Iss. 4, 2018.

^② Ching Kwan Lee, *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pp. 1-30.

^③ Martin K. Dimitrov (ed.), *Why Communism Did Not Collapse: Understanding Authoritarian Regime Resilience in Asia and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39.

运行上的差异。他指出，虽然国共两党都受到了列宁式政党理论的影响，但中共的组织建设更具穿透力，其对革命理念与现实政治的“揉和”更具说服力和吸引力^①。比较视野下的学术研究优势在于，一方面有助于明晰中共与其他政党之间的异同，精准把握其政治特质与内在优势；另一方面，比较研究也有益于将中共这一重要案例与现有政党理论进行深入对话，以生成新的理论框架和学术命题，不断拓展政党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第二，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注重实证分析。秉承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实证主义传统，海外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力求摒除宏大叙事和空泛议论，而是高度重视对具体事实、过程和细节的深入探究，在收集经验材料的基础上提出理论和验证理论。概言之，一切理论必须基于事实和证据。由此，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呈现出丰富多元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例如，爱荷华大学的唐文方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探讨了中国民众为何对执政党总是具有超高信任度的问题^②；芮杰明采取了民族志研究方法，在中国进行了长达十六个月的参与式观察和田野访谈，详细调研了社区居委会、居民区党支部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③；麻省理工学院的蔡晓莉通过深度访谈辅之以问卷调查的混合研究方法分析了农村社团组织与基层干部之间的亲疏关系如何影响了当地公共设施和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④。此外，近年来许多青年学者也开始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和列举实验（list experiment）方法来研究中共对网络舆情的管治策略、对社情民意的回应效度等前沿问题^⑤。

第三，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注重以问题为中心的专题研究。海外研究者往往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如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传播学、人类学等，且热衷围绕某一具体问题开展跨学科的对话、商榷甚至论战，从而不断深化对原有问题的认知与思辨。针对某一问题的专题研讨已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主流趋势，一些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知名区域研究期刊，如《中国季刊》《当代中国》以及《中国学刊》等，经常围绕某一热点问题组织跨学科的专题讨论与系列研究，不断推动以问题为导向、融合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2.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局限性

尽管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具有上述诸多优点，但其在理论预设、概念使用和研究结论方面依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理论预设拘泥于民主—威权二元论。海外学界深受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化理论影响，其研究出发点和理论落脚点是威权政体何时开启民主化进程，其核心议题始终纠结于中共主导的政治体制何时如苏东国家共产党那样转向西式民主政党体制。针对中共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展现出的卓越的政党调适性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海外学者不断追问的却是经济高速发展是否会带来政体变化？公民社会是否会挑战中共执政？新兴社会群体是否会对执政党提出政治参与新诉求？显然，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体现了西方的学术传统和政治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思维。“主

① Yongnian Zhe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al Emperor: Culture, Re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98–149.

② Wenfang Tang, *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nd Regime Sustainabi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5–19.

③ Benjamin L. Read, *Roots of the State: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in Beijing and Taipe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85–293.

④ Lily Tsai,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87–292.

⑤ Greg Distelhorst and Yue Hou, “Constituency Service Under Nondemocratic Rule: Evidence from Chin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9, No. 3, 2017; Tianguang Meng, et al., “Conditional Receptivity to Citizen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50, Iss. 4, 2014.

流的西方民主化理论在研究后发展国家的政治转型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效仿对象，试图将西式自由主义民主作为普世模板进行推销。”^①

当前研究基本沿袭了这一定式思维，将中共所进行的多领域多层次的改革措施与制度创新定格在威权政治理论框架之下。海外学界的研究前提依然是西方民主政体才是“美好彼岸”，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问题则是：中共是否正在转型？为何没有发生转型？是否即将崩溃？自冷战结束之后，民主—威权政体二元论实际上已经在西方社会科学界逐渐失去了其理论解释力和范式主导性。一方面，政体二元论无法解释真实世界的实际发展情况，特别是“混合型政体”（hybrid regimes）的出现，以及部分国家从一种威权转向另一种威权而未发生民主转变的客观现实^②。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国家民主政治衰败迹象的日渐显现和中国模式的日益成型，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比较政治研究的理论视角应从政体转型范式向政党良治范式进行转换。

第二，概念使用存在过度拉伸现象。任何概念及其相关理论都是基于一定历史条件与社会背景的产物，具有明确的边界或限制性条件。当某一概念跨越时空去解释其他类似现象时，其适用性往往面临质疑与挑战。例如，有些西方学者经常使用“autocracy”（专制）和“dictatorship”（独裁）这两个术语描述中共的长期执政。然而，这两个概念所要强调的均是个人掌握绝对权力的政治体制，如法国路易十四的君主专制、德国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智利皮诺切特的军事独裁等。显然，中共所实行的集体领导制与上述个人独裁专制案例具有本质差别，不加区分地简单套用无疑是一种概念误用。此外，海外学界习惯性地称中共执政为“一党制”，似乎暗示中共是中国的唯一政党，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八个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协商、共襄国是的制度安排。因而，这种表述也相当随意，缺乏严谨性、客观性和精准性。概言之，“社会科学中的很多概念和理论是根据西方的情况发展起来的，而各学科也假定这些概念和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地方”^③。然而，当这些西方社会孕育的概念“旅行”到非西方社会中时，其外延覆盖面的扩展必然导致内涵精确性的丧失，从而难以真正捕捉到事物的本原。

第三，研究结论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遵循了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所提倡的“中层理论”范式，反对宏大理论的建构，而注重从具体的经验观察中总结出有一定限度的中观理论。由此，学者们在研究中共执政理念与实践时，经常选择从小题目或微观层面入手，借助各种研究方法最大可能地获取实证资料，并“以小见大”地构建起解释中共治国理政的“一家之言”，往往会酿成以偏概全的谬误。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常见问题之一是重大议题的讨论却建立在狭窄有限的经验基础上。研究者往往根据田野调查的个别案例或现实中可以寻找到一些可量化的数据资料，绕开历史脉络、现实背景及客观实际，急于得出关于中共执政的一般性结论或重大发现。这些成果或许在方法上颇有新意，比较符合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科学”标准，但却时常忽视客观现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导致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元素消失。尤其是西方学界兴起定量研究潮流后，使得一些研究者对中共治国理政的历史背景、现实情景、客观条件不求甚解，甚至一些学者根本不懂中文，便匆匆忙忙搞数据、搞实验、搞模型，摇身一变成了“中共问题专家”。他们习惯于走马观花式的文献回顾，急于显示研究方法的前沿性，脱离具体情境和实际情况便得出一些或削足适履或盲人摸象或管窥蠡测的

①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西方民主化理论存在致命缺陷》，《求是》2016年第12期。

②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36.

③ [美] 欧博文：《与学科理论对话还是与中国研究对话》，管玥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38465。

研究结论，学术研究也异化为快速生产期刊论文的发表游戏。

总之，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既体现了西方实证主义传统的鲜明特征，又在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令人担忧的诸多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问题并非“钢板”一块，有些友好有些敌对，有些客观坦率有些轻率武断，有些观点鲜明有些投机善变，有些对中共怀有深挚情感，有些则带有个人偏见。这些持不同立场的学者或任职于顶尖学府，或受雇于高端智库，或就职于咨询机构，彼此之间对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各类问题时常展开商榷与辩论，共同构成了当前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多样图景。然而，抛开学者们所持立场与个人态度的差异与变化，仅从研究整体性、学术规范性、论证严谨性的角度来看，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在理论预设、概念使用和论证过程中均存在着上述共性问题。因此，国内学界对海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借鉴与参考需要慎之又慎。

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诸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问题已经无法依靠西方理论进行解释，而只能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理论与实践寻找答案。正如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资深研究员马丁·雅克所指出的：“西方国家的长期论点是，多党制是民主的一大优势，能够防止政党僵化和停滞。然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使自己保持活力与年轻的方法，而西方的政党却越来越疏远其代表的人民。”^①由此，中国共产党研究不能沉迷于生造理论、搬弄概念或卖弄方法，而应积极探寻中共能够应对执政挑战并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的战略思维和机制策略，并通过系统梳理和深入总结中共治国理政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向世界贡献政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國方案。

参考文献：

- [1] 韩强：《国外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研究述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9期。
- [2] 陈爱茹：《海外一些左翼对中共十八大和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评价》，《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2期。
- [3] 祝大勇、王雯姝：《核心价值观成为海外学者观察中国的新视角》，《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8期。
- [4] 路克利：《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
- [5] 闫健：《海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8期。
- [6] 梁怡：《关于21世纪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6期。
- [7] Allen Carlson, et al. (eds.),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New Sources, Methods, and Field Strateg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8] Vivienne Shue and Patricia M. Thornton (eds.), *To Govern China: Evolving Practices of Pow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编辑：张 剑)

^① 转引自《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带给世界的启示》，《人民日报》2018年3月10日。